

談俄羅斯語言學家 對世界語言學發展的貢獻*

寧琦/ Qi Ning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Beijing University

【摘要】

長期以來，俄羅斯語言學研究的理論成果沒能得到應有的重視。事實上，俄羅斯語言學家對語言的功能、結構、意義、認知等方面有著有別於西方學者的思想方法和獨到見解，特色鮮明，是推動語言學發展的重要力量之一。本文僅以俄羅斯語言學家對功能語言學、心理語言學以及巴赫金對語言學的理論貢獻為例，闡述他們對世界語言學發展的貢獻。

【關鍵詞】

俄羅斯語言學家 發展 貢獻

【Abstrac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of Russian linguistic researches have been ignored for a long time. As a matter of fact, Russian linguist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scholars in researching methods and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s function, structure, meaning and cognition etc. Their researches have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This thesis is to illustrate Russian linguist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s linguistics by studying their contribution to linguistic theories in such fields as functional linguistics, psycholinguistics and semiotics.

【Keywords】

Russian linguists, development, contribution

*本課題研究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2005年度規劃基金項目資助，項目批准號：05JA740001。

長期以來，相對於國外的學者，我國國內語言學研究者對俄羅斯語言學研究成果的關注和認識是不充分的，所推崇、引用的語言學理論幾乎都來自“西方世界”，分析的材料大多以英語語料為主。對俄羅斯語言學家思想的點滴瞭解多來自於西方學者研究成果中的文獻引用，對俄羅斯語言學研究的理論成果的瞭解和掌握始終處於滯後的狀態。事實上，緣於與西方不同的哲學思想體系、語言學研究傳統和思維方式，俄羅斯語言學家對語言的功能、結構、意義、認知等方面有著有別於西方學者的獨特的思想方法和認識，提出許多有關語言研究的獨特方法和獨到見解，具有自己鮮明的特色，為推動語言學研究的深入發展開拓了新的視野、提供了新的方法，這些觀點和方法很多已跨越俄羅斯本土，擴展滲透到整個東西方的學術研究領域，成為世界語言學理論研究和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組成。

1· 俄羅斯語言學家對系統功能語言學發展的貢獻

在國際語言學研究的舞臺上，布拉格學派從它形成之日起直至今天一直對世界各國語言學家從事語言學研究產生著深刻的影響。布拉格學派對語言學最重要的貢獻是從“功能”的角度看待語言，確立了共時語言學研究方法，這使布拉格學派一度成為影響世界語言學發展的最重要的力量和源泉，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歐洲任何其他語言學團體都沒有像布拉格語言學小組那樣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布拉格學派曾影響到美國語言學的每一項重要發展”（Bolinger 1968；胡壯麟 2002：309）。

在布拉格功能語言學理論中，有著極其深刻的俄羅斯思想方法和語言學理論的傳承和烙印，Ф. Ф. 福爾圖納托夫（Ф. Ф. Фортунатов/F. F. Fortunatov）、Л. В. 謝爾巴（Л. В. Щерба/L. V. Scherba）等學者的思想，特別是以И. А. 博杜恩·德庫爾特內（И. А. 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э/J. Baudouin de Courtenay）為代表的俄國著名語言學流派——喀山學派的語言學思想和方法對布拉格學派以及後來的歐洲心理語言學諸流派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喀山學派最早提出應當從根本上區分語言的語音方面和圖形方面，重視觀察活的語言和方言，強調研究方言方法論的重要性。博杜恩早於索緒爾（de Saussure）率先提出區分語言的靜態（共時性）和動態（歷時性），並認為這兩種對語言的研究方法都有各自的獨立性和特點，每一種現存的語言體系在同一時間既是交際工具，又是語言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片斷。他還區分了語言中生理和心理的過程和現象，認為“語言不論整體，還是它的各

個部分，只有當它為人們的相互交際的目的服務時，才有價值”。喀山學派十分強調語言的系統性，把語言看作是相互聯繫和相互制約的成分的系統。要求用科學的態度對待語言研究，不要把同語言無關的範疇強加給語言，而是要研究語言中實際存在的東西。所有這些思想在布拉格學派那裏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布拉格學派重要代表人物 Р. О. 雅可布森 (Р. О. Якобсон / R. O. Jakobson) 和 Н. С. 特魯別茨柯依 (Н. С. Трубецкой / N. S. Trubetzkoy) 等人均來自俄羅斯。當時就有相當部分的歐美學者把布拉格學派看成是莫斯科語言小組或者俄國形式主義的翻版，這並不是偶然的，儘管這種看法忽略了布拉格學派中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思想根源和其極其鮮明的國際化特點。

在布拉格學派的成員構成中，來自俄國的語言學家佔有相當的比重。根據錢軍參考很多文獻得出的資料，在布拉格學派全盛的經典時期，大約 50 名左右的成員中，來自俄國的就達 11 位，是構成布拉格學派的主體之一(錢軍 1995:18)。

布拉格學派重要的代表人物雅可布森和特魯別茨柯依是來自俄國的布拉格學派語言學家中的傑出代表，他們生在俄國，在俄國完成系統的學歷教育，為從事語言學研究奠定了至關重要的理論基礎及實踐基礎。雅可布森 1914 年考入莫斯科大學歷史語言學系，師從俄國形式學派創始人福爾圖納托夫的學生 Д. Н. 烏沙科夫 (Д. Н. Ушаков/D. N. Ushakov) 和 Н. Н. 杜爾諾沃 (Н. Н. Дурново/N. N. Durnovo)，在 1920 年僑居捷克斯洛伐克之前曾擔任著名的莫斯科語言小組的第一任主席，並參加彼得堡詩歌語言研究會的活動，正是在詩歌語言研究會裏雅可布森發表了其早期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的《論捷克詩歌》。特魯別茨柯依畢業於莫斯科大學，15 歲時就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在莫斯科大學畢業後還一度留在那裏任教，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離開俄國。在他們的思想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受到俄國語言學思想的深刻影響，打上了深刻的俄國意識形態傳統和語言學傳統的烙印，博杜恩，А. А. 沙赫瑪托夫 (А. А. Шахматов/A. A. Shahmatov)，謝爾巴，А. М. 彼什科夫斯基 (А. М. Пешковский/A. M. Peshkovsky) 等語言學家的理論對雅可布森和特魯別茨柯依的影響在他們的理論成果中隨處可見。而俄羅斯也從沒有把這些屬於俄國的布拉格學派語言學家看成是異國人，在對他們進行評介或觀點引用時的稱謂是“祖國語言學家”或“俄羅斯語言學家”(參見 Аксёнова 2001)。而且就研究傾向而言，來自俄國的布拉格學派成員傾向於理論體系的構造，確定並且加強了布拉格學派共時研究的方法，突出的貢獻集中表現在他們的系統和結構的觀點上(錢軍 1995:18))。這一點跟他們俄國意識形態和語言學思想傳統的出身是分不開的，他們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結構，講究整體

性，擅長運用辨證的方法來思考問題：研究中強調語言動態的變化，注重現實的同時注重歷史，認為事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都不是隨機的、而是有規律可循的。

眾所周知，在布拉格學派的諸多觀點中，最為重要的是：1) 對語言的共時研究，同時並不排斥歷時語言學研究方法。2) 強調語言的系統性這一本質屬性，指出對語言系統中的任何成分加以研究時，都必須明確該成分與同一語言中相共存的其他成分之間的關係：它們彼此功能上的對比或對立。3) 把語言看作是一種“功能”，是一種由某一語言社團使用的，用來完成一系列基本職責和任務的工具。

在布拉格學派的眾多學者中，雅可布森關於共時和歷時研究的思想、系統和結構的思想、功能的思想都是最具代表性的。其思想主要集中反映在《語音定律的概念和目的論的標準》(1927)、《語言和文學研究的若干問題》(1928)、《俄語音位進化及其與其他斯拉夫語言的比較》(1929)、《提交第一屆斯拉夫學者大會的論綱》(1929)、《語言符號和系統——Saussure 學說的重新評價》(1959)、《對話論》(1983) 等著作中。通過與索緒爾、新語法學派的理論體系的對比，在雅可布森看來，歷時和共時的對立揭示了語言在其存在的每一刻都具有系統性，語言無論在共時還是歷時都是一個系統，一個自我調節的系統。但共時和歷時方法之間並不存在截然的對立，並不是不可逾越的，如果共時語言學要從功能的角度評價語言系統的成分，不考慮語言系統經歷的變化是不充分的，事實上純粹的共時性是不存在的，每一個共時系統都有過去和未來。因此，歷時研究不能排除系統和功能的概念，而共時的研究不能排除演進的概念。關於對語言系統和結構的論述，主要圍繞系統的變化和系統的特點展開的。雅可布森認為語言不是一個孤立的事實的結合體，而是一個系統，但這個系統不是千篇一律，也非完整一塊。他曾十分明確地指出語言是一個系統的系統，是包含各種子代碼的總代碼。語言的變化是系統性的，而且總是朝著一定的目標。在系統的意義上討論的結構是一個連貫的整體，每種語言現象都是整體的一個部分，整體內部的各個部分相互聯繫，相互依存。雅可布森與索緒爾之後的許多語言學家的不同在於，沒有局限於“為語言而語言”和“只在語言中研究語言”，語言與各民族文化、語言與社會的相互作用一直是其關注的問題。他在參與起草的《提交第一屆斯拉夫學者大會的論綱》(1929) 中指出，“應該從功能的觀點出發著手進行語言分析，從功能觀點看，語言是一個總是服務於某個確定目的的表達手段系統”(Аксёнова 2001: 646)。因此，語言具有目的性是布拉格學派的功能主義的核心。言語活動的重要功能是滿足人們的交際需要。此外，言語活動表達說話人這樣或那樣的情

感並且引發聽話人這樣或那樣的情感。言語活動的另外一個功能是詩體功能。這些論點在後來的功能語言學學派的相關研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揚和發展。

布拉格學派最突出的貢獻還表現在其音位學說以及語音學和音位學的區別。在這個領域最有影響力的學者就是特魯別茨柯依。他最完整和權威的論述都集中在 1939 年出版的《音位學原理》一書中。特魯別茨柯依沿用索緒爾區分語言和言語的理論，提出語音學屬於“言語”，而音位學屬於“語言”。在此基礎上他又逐漸形成了“音位”的概念，以之作為語音系統的抽象單位來與實際發出的聲音相區別。音位可以被定義為若干不同功能的總和，而聲音當其能夠用來區別意義時也可以歸為音位。特魯別茨柯依對音位理論的貢獻涉及四個方面。首先他指出了語音的區別性功能並且給出了音位的精確定義；其次，通過區分語音和音位以及文體音位學和音位學，從而定義了音位學研究的範圍；再次，通過研究音位的組合關係和聚合關係來論證音位間的相互依賴關係；最後，他提出一整套用於音位研究的方法論，例如確立音位的方法和研究音位結合的方法（胡壯麟 2002：309-312）。

特魯別茨柯依在不同年代提出的許多觀點和原理成為後來一系列研究方向發展的基礎。在他引入《音位學原理》的一系列概念中，“對立（*оппозиция/opposition*）”這個概念對語言學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不同的一對（有時甚至是三個或四個）音位在這個或那個特徵上相互對立，兩個對立的成分可能在所有情況下都是對立的，例如俄語中的 л 和 р 在任何時候都是不能混淆的。但在一些位置上可能只有一個成分出現，如在俄語中成對的清濁輔音在詞尾是不構成對立的，這裏只能是濁輔音，兩個符號合成一個。據此特魯別茨柯依劃分出符號的“平等對立（*равноправная оппозиция/equitable opposition*）”和“不平等對立（*неравноправная оппозиция/inequitable opposition*）”。“對立”的概念後來不僅在音位學中，而且在語法學和語義學中都被廣泛地使用。特魯別茨柯依還第一個提出了“語言聯盟（*языковые союзы / language union*）”這個概念和術語，包括上述的“對立”思想都是對喀山學派博杜恩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這種“語言聯盟”是指不是基於相同的起源、而是基於長時間接觸而產生相同特徵的語言的聯合。處於接觸的一些語言，不僅可以獲得相同的辭彙特徵，更為重要的是可以獲得相同的音位和語法特點。“相鄰的語言，即使彼此不存在親緣關係，結果也會在發音結構和語法結構方面獲得一系列共同的特點，這些共同特點的數量取決於這些語言在地理位置上相鄰的時間的長短”（Ярцева 1998：617）。在此意義上，進入“語言聯盟”是以相同的文化特點為基礎的，如果語言的持有者

失去了相互的聯繫，語言聯盟將會終止存在。

這裏我們很難詳盡地敘述雅可布森和特魯別茨柯依研究過的所有語言學問題及其全部貢獻。值得額外提及的是，雅可布森和特魯別茨柯依與祖國的聯繫從未真正地中斷過。從 1956 年開始雅可布森多次回到蘇聯。他的每一次到來對祖國語言學家而言都是不可多得的與西方語言學思想接觸、碰撞的機會。在雅可布森先後僑居歐洲和美國的 60 年裏，為恢復祖國語言科學與國際語言學聯合會之間的聯繫付出了很多心血和努力。特魯別茨柯依僑居國外時發表的著作儘管基本上是德語和法語寫就的，但他始終認為自己是屬於俄國的。正是得益於雅可布森和特魯別茨柯依，十月革命前和蘇聯時期的祖國語言學家的許多重要思想得以走向世界，為國際語言學界所瞭解和認同（Аксёнова 2001：647）。

2·俄羅斯（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語言學家對心理語言學理論的貢獻

把言語看作是行為，把語言看作是活動的觀點始於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他曾指出“語言就它真正的實質而言，既經久不斷，又瞬間即逝。甚至它保留的文字也總只是一種不完整的、木乃伊式的保存，在生動地朗讀時又需要重新賦予意義。它本身不是產物，而是活動，它的真正意義因此只能是一個生成的定義。它也是使聲音具有表達思想能力的永遠重複的精神活動”（洪堡特 1985/1997：27）

但直到出現了語用轉向後，語言活動才成為語言學理論中的重要概念。上個世紀的 50 年代，心理語言學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的理論成果及其特色贏得了國內外同行的普遍認同和高度評價，在西方著名心理學家 J. Mehler 和 G. Noizet 的著述中，對心理語言學的發展階段和各主要流派進行研究梳理時，把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稱為世界“第三代心理語言學中最大、最有影響力的一個支派”（俞約法 1991：9），可以想見其在世界心理語言學界的地位。莫斯科語言心理學派的理論模式是把語言定義為人類活動框架範圍內的交際手段，將自己的理論體系稱為“言語活動理論（Теория рече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二十世紀世界著名心理學家、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的重要創始人Л. С.維果茨基（Л. С. Выготский / L. S. Vygotsky）於 1934 年在他有關意識的理論中就提出必須從社會背景，從勞動或活動過程研究語言的觀點。他指出“思維和詞語的關係不是一種事物，而是一個過程。這個關係是從思維到詞語和從詞語到思維的連續往復運動。在這個過程中，思維和言語的關係經歷了變化，思維不僅僅用言語表達，思維是通過言語才開始產生並存在的”（Выготский 1982：305）。也就

是說，思維在言語中的具體化，同時也是對具體表現在言語中的意義結構的改變。他認為，思維到詞語發展（即言語的產生）的第一個環節是動機，即“意識的動機領域，該領域包含著我們的欲望和需要，我們的興趣和誘因，我們的激情和情緒”。第二個環節是思維本身。第三個環節是思維在內部詞語中的表達。接下去第四個環節是思維在外部詞語意義中的表達。最後第五個環節是在詞語中的表達。思維的這種運動的實現是“一系列內部層次的運動，表現為由一個層次向另一個層次的轉化”（Выготский 1982：305）。維果茨基指出：“言語的內部的、有意義的、語義的方面和外部的、語音的方面雖然能形成真正的統一體，但它們各有其特殊的運動規律。言語的統一體是一種複雜的統一體，而不是同質的統一體”（Выготский 1982：305）。“言語就其結構而言並不是單純地像鏡子一樣反映思想結構的，這也就是為什麼言語不能像穿上一件現成的外套那樣套在思維外面。思維在轉化成言語時經歷了許多變化”（Выготский 1982：306-307）。在此基礎上維果茨基提出了內部言語學說，探討並確定了內部言語的三個主要的語義特徵，開創了對言語發展內部過程進行分析性研究的先河，這也是維果茨基對心理語言學研究的重要貢獻之一。

在分析言語和思維的關係時，維果茨基提出用“單位分析法（анализ по единицам/analysis into units）”代替傳統的“成分分析法（анализ по элементам/analysis into elements）”，這應該可以看作維果茨基對心理語言學研究領域又一重要貢獻，這也是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與西方心理語言學派的重要區別之一。西方心理語言學派側重對已生成的話語進行分析，是對話語成品的靜態的結構成分的分析，即成分分析法。而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側重對言語生成過程本身的分析，採用的是對言語活動的動態組合單位的分析，即由維果茨基最先倡導的“單位分析法”。維果茨基認為，之前研究言語和思維關係的人之所以遭遇失敗的原因就在於他們採用的是“將複雜的心理整體分解為各種成分的分解法”（Выготский 1982：299-300）。他指出，在用這種分析法進行分析的過程中，言語思維原有的特性已經消失，我們獲得的是失去整體原有特性的結果，並不是真正的分析。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單位分析法”，他認為複雜的心理整體可以分解為基本的“單位”，這種“單位”與“成分”不同，每個“單位”以簡單形式保留了整體的所有特徵（Выготский 1982：300）。正如生物分析的真正單位是“活生生的細胞”，它保持著有機體所固有的一切基本特性。思維與言語的關係也需要有這樣的單位，它本身應該包含言語思維作為整體所固有的特性。這種最基本的單位在維果茨基看來就是詞的意義——詞的內部方面，對現實的概括反

映，詞的意義是兩個彼此緊密聯繫的言語機能（社會交往機能 and 思維機能）的單位。這種單位分析法兼有分析和綜合的優點，其分析結果保留了“整體所固有的一切基本特性”，從而為用最簡要的形式來研究複雜的心理機能系統提供了可能性。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認為（所有）活動的動態組合單位是行為動作（действие / action），而構成行為動作的動態組合單位是運算（операция / operation）。運算是任何一項活動的基層單位。將這個原理應用於心理語言學研究中的言語活動分析，得出相應的三個層次的動態組合單位：言語活動→言語動作→言語運算。因此言語運算是言語活動的最小單位，而心理語言學應研究的主要問題就是構成言語生成和言語理解過程的各個層次的組合單位之間的結合規律以及這些單位的相互關係系統和規律（俞約法 1991：13）。

實際上，維果茨基在自己的著作中從未使用過“心理語言學”這個術語。但他對話語研究的心理學觀點不僅成為這一研究方向獨特的成果總結，而且為心理語言學學科及其理論的創立打下了最初的理論基礎。從某種意義上講，維果茨基心理語言學思想的誕生，意味著俄羅斯心理語言學的形成早於西方，只是由於當時複雜的社會及意識形態原因，使得維果茨基的心理語言學思想到二十世紀的 60 年代，隨著心理語言學在西方的興起，才在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的認同和研究。素有“俄羅斯心理語言學之父”之稱的 А. А. 列昂季耶夫（А. А. Леонтьев/A. A. Leontiev）曾評價說：“1934 年去世的維果茨基已經提前幾十年預見到了話語心理學和心理語言學的發展”（Леонтьев 1997：50）。他認為，維果茨基不僅是莫斯科心理學派的創始人，也是俄羅斯心理語言學的奠基人，因為在他的心理學研究中，從心理學的角度大量關注了言語的生成和理解，這恰恰是幾十年後心理語言學關注的中心問題之一。因此，維果茨基被視為現代心理語言學的創始人之一是當之無愧的。

此後，А. Н. 列昂季耶夫（А. Н. Леонтьев / A. N. Leontiev），А. Р. 盧裏亞（А. Р. Лурия / A. R. Luria）等人補充和發展了維果茨基的相關心理語言學理論。這種理論模式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主體（人的心理）和客體（真實世界）之間的對立關係是如何逾越的。他們所看到的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是主體對客體有意識地產生影響，其中介方式是人的實踐，即人類的活動。А. Н. 列昂季耶夫在二十世紀 30 年代中期提出了言語活動的結構和單位等擴展型理論概念和活動與意識統一原則。盧裏亞建立了失語症的心理語言學構想，於 1968 年率先提議並在語言學、病理學和神經學的交叉領域使用“神經語言學”這一術語，使這一術語得到廣泛的傳播。他從神經心理學和神經語言學的角度為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

的建立提供了充足的科學依據。

上述三位心理語言學家的研究成果被譯介成多種文字，得到了西方同行的廣泛認同，而早期的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更有“維-列-盧學派”之稱，擁有鞏固的國際學術地位和廣泛的世界影響力。形成於二十世紀 70 年代的“新心理語言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國心理語言學家 J. Weinreich、法國心理語言學家 J. 梅勒等是“維-列-盧學派”思想在西方的專家，是“維-列-盧學派”學派思想的積極宣傳者和支持者。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維果茨基的心理語言學思想，主張必須建立一種獨立於語言學模式、同時具有認知特徵和交際特徵的心理語言學，把心理語言學過程放在更寬泛的思維、交際和記憶的環境空間中去研究。

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的語言學基礎來自俄國喀山學派語言學家博杜恩和蘇聯語言學家謝爾巴。謝爾巴的《論語言現象的三個方面的語言學中的實驗》(1931) 被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奉為其學科建設的語言學經典。謝爾巴提出的關於“區分語言系統、語言材料、言語活動”的觀點，特別是他對“言語活動”論述，成為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建設自己學派的重要語言學論據 (Красных 2001: 86-87)。

二十世紀 60 年代，A. A. 列昂季耶夫 (下文均稱為列昂季耶夫) 成為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的領軍人物。列昂季耶夫是一位語言學和心理學功底都非常深厚的學者，他最初的學術活動始於博杜恩·德·庫爾特內的語言學思想研究，他的副博士論文題目是《И. А. 博杜恩·德·庫爾特內的一般語言觀》。自二十世紀 60 年代以來，列昂季耶夫一直致力於心理語言學的理論研究，他繼承和發展了“維-列-盧學派”的思想，完善了有關“言語活動”的系統理論。他在 1965 年出版的《言語活動中的詞》一書，被譽為俄羅斯心理語言學派的“言語活動理論”的奠基之作，以他為代表創立的“言語活動理論”成為二十世紀獨樹一幟的心理語言學理論，他本人被譽為“俄羅斯心理語言學之父”。

列昂季耶夫認為人類的活動是一個有意識、有目標和有結構的活動，這是人類面對自然界的一種方式。這種以人類活動為基礎的理論與行為主義理論的不同在於，它並不僅僅局限於對外來的刺激做出被動的反應，而且有別於那些把人類的這種活動與任何行為全然等同的理論，它更加重視作為主體的心理世界的發展，因為主體的內心世界只能在活動中和通過活動得以發展，通過這種方式主體和客體之間形成了一種辨證的交互關係。

人的生活實踐由無數活動組成，它們之間存在著緊密的關係。這些活動的基礎是實踐性的和以客觀世界為物件的活動，這種活動與精神活動密切相關。對於列昂季耶夫來說，言語行為應理解為屬於人類活動範圍的行為的一個專門類別。

言語過程與其餘的以客觀世界為物件的實踐活動和精神活動的基本特徵相同，唯一的區別在於語言不是以客觀事物為物件的，而是原則上針對某個主體，即其他人。言語交際活動的這種主體相關性卻不能僅僅被解釋為資訊傳遞，也不是單方面地對交際對方施加影響，而是一種相互的影響、一種思想的雙向交流，甚至也是交際者主觀態度形成的過程（Леонтьев 1974/1997）。總而言之，這種主體相關性是一種社會過程，對一個社會的內部組織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交際因而是具有社會性質的交互活動。這種主體相關性和言語生產者將自己的主觀意識轉換成語言表達的形式共同構成了言語交際活動的一個特點；在言語裏以物質的形式（如語音）表達出來的內容由聽者通過理解進入內心世界，構成言語交際活動的另一個特點。

上述有關人類活動的理論，除了在俄羅斯本土，還被世界各國心理學家、語言學家和心理語言學家競相採用，他們進一步發展了列昂季耶夫的基本觀點，並通過一系列的實驗和實踐證實交際活動並不僅僅是交際者個人之間的資訊傳遞，而是人類活動的一種特殊形式。在語言學領域，上個世紀 70 年代，德國語言學家為其理論和方法的發展做出的重要貢獻和突破是對語言活動包含的目的成分做出明確的定義，把它確定為交際行為的調控機制。其後的語言學家，將該理論成果運用於單一語言行為分析、單一語言行為的局部目的與篇章的整體目的相互關係分析等，在篇章語言學研究、言語行為理論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錢敏汝 2003：51-52）。在心理語言學領域，美國“新心理語言學派”借鑒、吸收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一貫堅持的心理學研究取向，摒棄了以喬姆斯基為代表的專注語言學取向的第二代心理語言學，重新把理論取向從語言學轉回心理學上來。也正因為這一點，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被譽為世界心理語言學三大宗派（三個時代）中的第三代諸多支派中最有影響者，而他們自己也以第三代心理語言學的正宗和領袖自居。

對比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和西方諸心理語言學派，他們的研究物件是一致的，主要致力於如下四個方面的研究：言語的生成、言語的理解、語言習得或言語的掌握、言語交際。他們的區別在於不同的哲學指導思想和方法論。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力圖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把言語活動這一現象置於社會-人際關係-交際關係背景中加以考察，從“社會和個人相統一”、“社會性和個體性相統一”的觀點來看待言語活動，從而找出其內在的規律及其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另外，又從言語活動與意識相統一的辯證法出發來解決語言與思維的關係問題以及由此引發的關於智慧的規律性問題，進而更有效地揭示人的智慧與人工智

慧的共同點和差異性，有助於人工智慧問題研究的深入。他們把“活動法（*деятельностный подход*）”作為自己的基本研究方法，從“活動”這一新角度來觀察人的言語現象，把它看作是一種同別的一切活動都一樣具有明確目的性、動機性和主觀能動性的個體心理活動，同時又從這個角度出發剖析言語活動過程的心理動態過程。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一直認定心理語言學的研究方向和取向都應當是心理學的，而不是語言學的。因此可以說，他們的心理語言學實質上是言語心理學（俞約法 1991：12）。採用“單位分析法”分析言語生成和理解的過程，關注的是言語活動本身的過程，而非對已經生成的言語成品進行靜態分析的“成分分析法”。在對整個心理語言學學科理論進行系統概括時莫斯科心理語言學派提出了一整套不同於西方的結構嚴密、富有特色的理論框架（Леонтьев 1974/1997）。

俄羅斯心理語言學理論自創建以來以其獨特的哲學指導思想、研究方法、研究物件以及研究視角和取向區別於西方心理語言學，為世界心理語言學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3·俄羅斯著名學者 М. М. 巴赫金對語言學理論研究的貢獻

М. М. 巴赫金（М. М. Бахтин / M. M. Bakhtin）是二十世紀俄羅斯的一位傑出思想家、文藝批評家、哲學家 and 語言學家。在二十世紀 60 年代以前，國際學術界對巴赫金的思想其實是一無所知的。巴赫金的思想最初是在法國巴黎的結構主義者當中引起強烈反響。1967 年，J. 克裏斯特瓦（Julia Kristeva）在法國《批評》雜誌上發表了題為《巴赫金：詞語、對話與小說》的論文，闡釋並修正巴赫金的對話理論，之後她又對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和《拉伯雷的創作和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等著作進行了評注，促成它們的法文版和英文版於 1968—1970 年間問世。巴赫金以 В. Н. 沃洛希諾夫（В. Н. Волошинов / V. N. Volochinov）之名發表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哲學》（1929）一書在 1973 年被譯成英文，其他著作大多在 80 年代才得以出版。

而我們國內，1993 年 11 月在北京大學舉行的“巴赫金研究：西方與中國”研討會是國內第一個關於巴赫金研究的會議。巴赫金研究成為當代思想界的熱門話題堪稱奇跡，西方學術界派別林立，相互間論戰不休，但他們卻都能從巴赫金的理論體系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養分，這充分證明瞭其理論的博大精深和令人嘆服的前瞻性。胡壯麟先後發表了《巴赫金與社會符號學》（1994）、《走近巴赫金的符號王國》（2001），論述巴赫金的思想對現代語言學理論的影響，分別討論了

巴赫金語言學思想對索緒爾理論和研究方法的挑戰、對當代系統功能語言學的理論框架構建的影響、以及其符號學觀點的深遠意義。

巴赫金早期的一些著作是以他的朋友沃洛希諾夫、П. Н. 梅德維傑夫(П. Н. Медведев/P. N. Medvedev) 等人的名義發表的，但關於這種說法在校勘學方面存在很大爭議，因為不是所有以這些人名字發表的作品都確信無疑是巴赫金寫成的。俄羅斯的二十世紀 20 年代本來就是一個集體創作的年代，當時很多語言學研究成果都是集體創作的結果(Колесов 2003 : 367)。當時正是俄羅斯社會的重大變革時期，舊的風習的瓦解造成了嚴重的文化損傷，這在當時的知識份子階層引發了對最重要的存在與本質問題的激烈爭論和思考。類似的情形也正形成於今天的西方——也許這就是他們對巴赫金的“方法”表現出極大興趣的原因所在。世界格局的分化、人性的墮落、傳統科學的被破壞，要求必須用哲學解釋正在發生的事情。巴赫金給出了自己的答案，而且這些問題在今天仍是十分重要而迫切的現實問題，巴赫金的回答也就顯得尤為重要。

巴赫金早期的著作主要是批判不為他所接受的科學方法。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哲學》一書中，巴赫金分析了洪堡特語言哲學的個人主觀主義和索緒爾的抽象客觀主義。他認為，作為語言符號客觀已知的符號系統的語言共時系統的概念否定了語言的文化價值，否定了語言系統和它的歷史之間的聯繫。他指出，如果從真正客觀的角度出發，語言呈現出的是處於形成過程中的不斷流動的畫面，因此在時間中沒有一個可構建語言共時系統的真正時刻，語言形式始終處於可變化、可調節的狀態。以梅德維傑夫名字發表的《文學研究中的形式主義方法》(1928)把形式主義看作是關於詞語的結構意義的學說，而且只關注它的外在形式。對於巴赫金而言這是不可接受的。巴赫金反對把語言本身與外部世界分開。他認為構成任何話語、任何經驗的中心不在其內部，而是在其外部——在圍繞個體的社會環境中。語言交際離開了具體的語境和聽眾就不能實現、理解和解釋(Колесов 2003 : 368)。

巴赫金的主要貢獻在於他整合了戰前彼得堡大學的許多學者共同努力建立的哲學、邏輯基礎和二十世紀人文科學的現實成果。我們在此並不是要說明，目前被認為是巴赫金首創的許多術語和概念並不是由他首先提出的，而是嘗試全面描述巴赫金對語言和詞語的基本觀點。巴赫金不同意把語言系統同話語截然分開，人的思想和意識都要通過符號才能實現，而符號不能與社會交際的具體形式相脫離，是為實現交際目的服務的。詞語不是一種具體事物，而是交談過程中一直活動著的、變化著的媒介。這樣看來，詞語的生命體現在不斷的傳遞過程中：

從一個說話人向另一個說話人、從一個語境向另一個語境、從一個社會集團向另一個社會集團、從一代人向另一代人，因而詞語的所指和能指也處在一種相對的變化中。

巴赫金對語言學的另一個重要貢獻在於他的對話（диалог/dialogue）理論和語言的雜合性（heteroglossia）觀點。話語必然依附“人”這個主體存在，單個的話語也是不能存在的。對話不僅僅是說話雙方之間的對話，還是與自己的世界觀、觀點的對話，是說話人自身的“本我”和“他者”的對話。當話語涵義與對話語境聯繫起來，做出對“問題的回答”。話語形式就是言語體裁（речевой жанр/speech genres），即對應於人類生活領域的言語交際形式和類別，這如同人們觀察客觀世界的眼睛（Morson & Emerson 1990:276；凌建侯 2000：180）。言語體裁具有記憶能力，本身也就包含了對話潛能。語言的雜合性在於語言表示了現在與過去，過去的不同時期、現在的不同社會意識集團、不同傾向、團體等之間的社會意識矛盾的共存，儘管它們有著各自不同的體現形式，但它們又以種種方式相互交叉，在社會上形成新的典型的語言。因此在研究語言時必須考慮語言的雜合性。巴赫金認為：言語，話語，這就是人類生活的全部，但不應該認為這種具有多種面目的全部現實是一門單獨學科語言學的客體，只能借助於語言學的方法去理解。而這種語言學之外、與語言學有關的學科，巴赫金在後期著作中將它稱為元語言學（металингвистика/metalinguistics）（托多羅夫 2001：207）。元語言學所研究是在社會環境中與人的言語思維和行為密切相關的語言的內容方面的特性，即語言的使用規律。語言的使用、語言符號的功能對於語言系統而言是第一性的，從這個意義上看篇章先於句子，句子先於詞語。整體重於部分。

巴赫金思想對法國巴黎結構主義的影響只是他世界聲譽的一個例證而已。他對符號學的傑出貢獻也已經得到充分的關注（胡壯麟 2001）。當系統功能語言學家在上個世紀 80 年代接觸到巴赫金的思想後，也立刻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對巴赫金的思想持接受吸收的態度，對他的思想按當代人的觀點做出解釋，尤其是他的言語體裁理論對系統功能語法產生巨大的影響（胡壯麟 1994：53-54）。所有這些成就對他本人而言也許都是始料未及的，他所處的特定的時代造就了他的思想，卻又使他在他的時代默默無聞，沒有放射出應有的光芒。但相對於一些同一時代的學者，他又是幸運的，自己的思想終於撥雲見日並發出耀眼的光芒，即使時至今日，人們仍在他的著作和思想中孜孜求索，希望從他的理論中找到或求證自己的方向。

4· 結語

我們選擇了以上三個角度，目的並不僅僅在於闡述以雅可布森和特魯別茨柯依為代表的俄羅斯語言學家對布拉格功能語言學派理論的創立和發展所作的傑出貢獻，分析俄羅斯心理語言學派作為重要的世界心理語言學支派所提出的獨特的理論體系和方法，論述巴赫金主要的語言學思想及其國際影響力。俄羅斯語言學研究及其語言學家取得這樣令人矚目的成就絕非偶然，其共同的特徵在於他們的思想深深地紮根於優秀的俄羅斯語言學傳統和方法的土壤裏，擅長運用辯證的方法來思考問題：研究中強調語言動態的變化，注重現實的同時注重歷史，擅長宏觀把握和總結事物的規律，注重結構，講究整體性。正是這些使他們在索緒爾理論占統治地位的西方語言學界能用俄國特有的意識形態和語言學傳統對索緒爾理論和研究方法提出挑戰或賦予更新的內容，使他們得以在當代結構主義語言學、功能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符號學等學科領域的發展中佔據屬於自己的領地。

事實上，在俄羅斯語言學發展史中，有許多可圈可點的人物。十月革命後，俄羅斯和國際語言學界的聯繫曾一度中斷，到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得以逐步的恢復。此後俄羅斯語言學家一直同歐洲其他國家以及美國語言學家保持聯繫，並且一直就西方語言學的各種新動向進行認真而有益的討論，他們在普通語言學、詞典編纂學、語音學、語法學、斯拉夫語言等方面的研究中都取得了非常可觀的成就。學術界公認法國著名語言學家泰尼埃爾（L. Tesnière）的“配價理論”對語言學的貢獻，而俄羅斯語言學家 С. Д. 卡茨涅爾松（С. Д. Кацнельсон/S. D. Kacnelison）早在 1948 年就系統地論述了配價理論，並使用了“價”這個術語。在印歐語系研究方面，由於蘇聯學者 Т. В. 甘克列裏澤（Т. В. Гамкрелидзе/T. V. Gamkrelidze）和 В. В. 伊萬諾夫（В. В. Иванов/V. V. Ivanov）的論著的發表，關於印歐語言的發源地、擴散、結構的理論，有可能發生具有深遠意義的改變（羅賓斯 1997：225）。近年來，俄羅斯語言學家又提出了語言世界圖景理論，這是他們對語言認知研究的又一貢獻。關於他們的成就我們將在以後的相關論文中進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以期與國內語言學界同行共同分享俄羅斯語言學研究的理論成果。

引用書目

- Алпатов В. М. (2001), История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учений, М.:STUDIA PHILOLOGICA.
- Выготский Л. С. (1982), Мышление и речь, Сбор. Соч. Т. 2, М.:Педагогика.
- Колесов В. В. (2003),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ознания, СПб.:Изд-во С.-Петербур.ун-та.
- Красных В. В. (2001), Основы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и и теории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М.:Гнозис.
- Леонтьев А. А. (1997), Основы психолингвистики, М.
- Леонтьев А. А. (1974), Основы теории рече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Отв. ред. А. А. Леонтьев, М.
- Гл. ред. Аксёнова М. Д. (2001),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для детей》, Т. 10 《Языкознание.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М.:Аванта+.
- Ярцева В. Н.(1998), 《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М.
- 洪堡特 (1985), 《語言與人類精神》, 錢敏汝譯, 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
- 胡壯麟主編 (2002), 《語言學教程》,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胡壯麟, 巴赫金與社會語言學,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年第 2 期。
- 胡壯麟, 走近巴赫金的符號王國, 《外語研究》2001 年第 2 期。
- 凌建侯, 話語的對話性, 《外語教學與研究》2000 年第 3 期
- 羅賓斯 R.H. (1997), 《簡明語言學史》, 許德寶等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錢敏汝 (2003), 《篇章語用學概論》,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錢軍, 布拉格學派歷史研究, 《外語學刊》1995 年第 1 期。
- 托多羅夫 (2001), 《巴赫金、對話理論及其他》, 蔣子華等譯, 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 許高渝, 維果茨基和蘇俄心理語言學, 《心理學新探》2001 年第 3 期。
- 俞約法, 言語活動論概觀, 《外語學刊》1991 年第 3 期。